

姚 / 江 / 溯 / 源

□司马雪



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,要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,对我来说似乎有些困难,但走遍宁波的三江六岸,应该不成问题。因此我很想沿着姚江溯流而上,领略姚江两岸的田野风光和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人文景观,寻找地域文明的踪迹。

钩沉索隐 探寻宁波文化之谜 ①

我知道,在姚江两岸,有梁山泊和祝英台的传说,美丽得如同萋萋芳草上款款飞舞的蝴蝶;有河姆渡的遗址,那里每挖下去一米,跨越的可能就是一千年的历史……谁能说这不是一条充满神奇魅力的旅游之路呢?

不过,走遍宁波的三江六岸首选姚江的初衷,倒是因为明人赵宽的一首词。这是用减字木兰花曲牌写成的《姚江阻雨》。词意并不玄奥,不妨让大家共享一下:“寒风吹水,微波皱作鱼鳞起。白雨横秋,秋色萧条动客舟。疏钟何处?知在前村黄叶树。茅屋谁家?荒径无人菊自花。”赵宽写这首词的时候,估计是在浙江提学副使的任上。寥寥数语,把秋雨中的姚江写得令人心驰神往。但实事求是地说,点睛之笔“荒径无人菊自花”,应该是化用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。

由于这首词的缘故,我觉得在踏上姚江堤岸之前,对姚江作一番另一种意义上的溯源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
于是就有了一个简单的想法,姚江为何叫做姚江?不料这简单的近乎愚蠢的设问竟牵涉到一个复杂的文化之谜。原来据有些典籍记载,姚江是以虞舜的姓(姚)命名的,所以又称为舜水,至少宁波的先贤黄宗羲在《孟子师说》是持这一说法。

黄宗羲说:如果按照《史记》的说法,“舜,冀州人,耕于历山,陶于河滨,作什器于寿丘,就时于负夏……”,那么,“孟子何言云东夷乎”?黄宗羲的结论是——“是《史记》不足凭也”。

黄宗羲说:“今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。其水经余姚者,曰姚江,亦曰舜江。……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。”然后,黄宗羲找了一堆古籍,来证明舜就是

出生在余姚上虞一带,是“东夷之人”,并说这些证据“与孟子之言相合”。

这无疑激发了我追问的兴趣:虞舜何许人也?为什么要以他的姓命名?换一句话说,舜与姚江有什么关系?(当然,黄宗羲说了,舜本来就是这里的人。但这一说法是标准答案还是一家之言呢?)于是去查可以找到的典籍,看了之后,算是初步弄清了来龙去脉,但也因此觉得有些问题更加扑朔迷离。

对我们来说,“自从盘古开天地,三皇五帝到如今”并不是一句很生疏的话,而这虞舜就是“三皇五帝”中的五帝之一,治水有功的大禹就是他提拔起来的,并最终把位置禅让给了大禹。应该说虞舜的名气大得不得了。《史记》云:“天下明德,皆自虞帝始。”虞舜的文化精神之魂,有人概括为“德为先,重教化”,是部落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转折。

史学上一般认为,虞舜是原始社会晚期部落大联盟的首领。但由于记载上古史实的档案文献奇缺,到了有案可稽的时候,已经很难分清虞舜到底是神话传说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了。譬如《荀子·非相》说“帝舜短”,意思大概是想说明舜的身材不是很高大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说“舜黧黑”,这是不是说舜的皮肤不是一般的黑?《孔丛子·居卫》说“舜面颌无毛”,是在说没有胡须吗?还是说一般人毛发偏长,而舜超凡脱俗、只有他“面颌无毛”?最有意思的当数《尸子》卷下的记载:“舜两眸子。”哪个人不是两眸子?可见这些典籍还是用对待神的眼光来描述舜的,充满了神话传奇的色彩。

但舜又是上了《史记》的人物,司马迁在《五帝本纪》中把舜的故事演绎得活龙活现,充满了人格化的魅力,倒像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物,而不是虚无缥缈的“神物”。

我想,无论舜是神还是人,倘若姚江是以他的姓命名的,对宁波人来说真是一种荣耀。

问题是舜与姚江有什么瓜葛,为什么要以他的姓命名姚江?原来《墨子·尚贤下》有“昔者舜耕于历山,陶于河滨”的说法。可见,《史记》对舜生平的叙述,是参考或者整合了以前传下来的文献资料。连黄宗羲也承认,“历山,晋地”,《史记》中所列出的一些与舜有关的地名,“皆中土也”。但是,余姚恰好也有历山,有虞舜的种种传说和地名意义上的遗迹,所以黄宗羲凭借孟子谓舜为东夷之人的说法,觉得当年舜耕作之处就是余姚的历山。黄宗羲还说,舜当年耕耘过的地方,“耕者往往得古陶器”。按照我的理解,黄宗羲的意思是舜不但是“耕于历山”——当然是余姚的历山,并且还“陶于历山”。

黄宗羲还搬出南北朝时期文字训诂学家、史学家顾野王(519-581)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顾野王认为,“余姚舜后支庶所封之地”的说法是不靠谱的,“乃附会《史记》,而后人反信为实然”。他觉得“舜之生在余姚上虞,故曰东夷之人”。“迁于负夏,始在中土耳”。意思是舜的原籍是余姚上虞一带的,后来才到负夏,踏上了中原的土地。

读过黄宗羲这段文字的人,也许有人会觉得顾野王似乎有点底气不足,在前面用了“大概”二字。其实这是对“大概”的误解。这“大概”,是表示“大致情况”(在古代汉语中用得比较多),而不是表示推测。

不过作为中立的旁观者,我也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说一句:倘若那些说余姚仅仅是舜的后裔所封之地的人,“乃附会《史记》”,那么顾野王以及黄宗羲的观点,何尝不是“附会”孟子?

况且,中国九州方圆,叫做历山的地方有好几处,光是古籍上有记载的关于舜“耕于历山”的说法就有好几种。同是《水经》这本书,《瓠子河注》里指山东菏泽的东北,“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……谓之历山,有陶墟,为舜耕陶所在”。《河水注》里指山西永济县东南(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“晋地”),“历山谓之历观,舜所耕处也”。当然也有认

为是余姚历山的。唐代的著作《括地志》干脆把众说纷纭的几种说法都记录下来,以至现在的《辞海》还是沿用这些有关历山的说法,使舜到底耕作于何处的历山成为千古之谜。

从年代上来讲,孟子要比司马迁早两百多年。孟子所以说舜是东夷之人,必定有他的文献依据。但是孟子所能看到的文献,到了司马迁的年代,就未必看得到——因为这两百年是社会急剧动荡和变化的两百年(奴隶制的彻底崩溃和封建制的建立),加上战火频仍,文献的灭失是大概率事件。以司马迁学问,肯定也注意到了孟子的观点,但他没有在《史记》中采信,估计是他觉得这仅仅是孟子自己的说法而已。而对孟子来说,在当时(早于司马迁年代的两百多年),舜是东夷之人是“众所周知”的,没必要详细陈述。历史性的误会,或许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但是,不论怎么说,从某种角度上来说,河姆渡旁边的这条江,以虞舜的姓(姚)命名,是天经地义的事,有其历史底蕴的必然性。

谜往往由于时间造成的。我想,出于对上古时代神性英雄的崇敬,九州方圆的先民们取众多相同的具有纪念性质的地名,建有众多象征意义的古人遗迹,以怀念他们所敬仰的先辈,以至到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已经众说纷纭了,这除了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之外,更深刻反映的是同是炎黄子孙的一种民族认同感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,舜是不是耕于余姚的历山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。当然,我并不反对史学界继续考证下去,能揭开千古文化之谜并不是什么坏事。

不过经过这一番典籍上的溯源,对我来说,真真切切地踏上姚江的堤岸,作一次空间上溯源的兴趣更加浓厚。不知谁愿意与我同行?

